

辛亥革命与近代传媒法制

陈根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 北京 100720)

摘要: 辛亥革命成亦传媒败亦传媒。1903 年的“苏报案”是辛亥革命前史中第一次革命高涨期的直接契机, 1911 年 8 月的“大江报案”则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南京临时政府初期在传媒法制方面, 曾经推行了比当时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广泛更宽容的无限制言论自由原则。1913 年袁世凯政府制造的“癸丑报灾”成为了民国传媒法制的转折点, 1925 年的火烧晨报馆事件则预示了近代传媒法制中“不宽容”时代的诞生。辛亥革命时期传媒法制思想的光与影同在, 值得我们汲取和警觉。

关键词: 传媒法制; 苏报案; 大江报案; 癸丑报灾; 火烧晨报馆

作者简介: 陈根发(1964—), 男, 浙江嘉兴人, 法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传媒法、法理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5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1)06-0174-07 **收稿日期:** 2011-06-25

辛亥革命与近代传媒法制有着非常奇特的相互依存关系, 这不仅表现在辛亥革命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就是清廷对资产阶级革命报刊和近代传媒法制思想实行弹压的“大江报案”, 而且辛亥革命的失败也与近代传媒法制建设的“虎头蛇尾”有很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辛亥革命成亦传媒, 败亦传媒。据不完全统计, 辛亥革命爆发前的 10 年间, 全国有将近 1 100 多种报刊问世, 也就是说平均一年有 100 多种, 与戊戌变法期间的一年 40 余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1]92} 辛亥革命后, 改良派的梁启超在给罗癭公的信中说: “今兹革军之奏奇功, 得诸兵力者仅十之三, 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革命派代表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演说中也曾表示: “此次中国推倒满清, 固赖军人之力, 而人心一致, 则由于各报鼓吹之功。”^[2] 林语堂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一书中, 对辛亥革命与传媒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总结: “可

以说, 1911 年的革命, 就是这些报刊的作者冒着极大的风险利用各种方式煽动的结果。这个时期(1895—1911), 可以说是中国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3]82} 但是, 从 1913 年开始, 资产阶级革命报刊由于缺乏自律和法律的保护, 使得袁世凯政府得以制造骇人听闻的“癸丑报灾”, 辛亥革命时期兴办的报刊大多被查封, 全国报纸从 500 多家锐减到 130 多家, 辛亥革命的烈火也因此被扑灭。

一、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一) “苏报案”与辛亥革命

《苏报》原本是一份具有日本背景的日报。1896 年夏创刊于上海, 馆址设在英租界四马路东首, 注册于日本驻沪总领事馆。这份报纸虽然是由胡玮(铁梅)主持, 聘请当时上海著名文人邹弢为主笔, 但馆主却是胡玮的日籍妻子生驹悦。这份后台很硬的报纸, 起初在政治倾向上追随康有

为、梁启超等人的“忠君保皇”思想,1898年因亏损过多而出售予陈范。此后的《苏报》与当时许多日报有一个不同点,即《苏报》多刊载有关政界、学界方面的情况,并逐渐与其他进步刊物结上连带关系。报馆还代售留日学生出版的《游学译编》,并为之刊登告白。其所主张者,由变法而保皇,由保皇而革命。^{[4]79}1903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年头。留学生中的爱国斗争和国内学堂中的“学界风潮”,成为新型知识阶层登上历史舞台的阶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革命,终于在拒法、拒俄运动的高潮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在这革命形势高涨的岁月,《苏报》始终站在浪峰之巅,它既是新型知识阶层的喉舌,又是他们的政治活动的指导者。在《苏报》所刊登的文章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章太炎)为之作序。在《序革命军》中,章炳麟对“革命”一词作了解释:“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5]31}章炳麟在序中还公开称光绪为“载恬小丑”,这对于外来的清政府而言,当然是无法容忍的。1903年6月29日上午,侦探、巡捕多人闯进位于汉口路的苏报馆,出示逮捕令,当场抓去账房程吉甫。第二天,章太炎在爱国学社被捕,钱宝仁和陈范的次子仲岐在女学报馆被捕。龙积之、邹容先后投案。

章太炎、邹容等被捕后,一场以洋人为法官,清政府为原告,《苏报》为被告的特殊审判上演。在租界公堂审理此案时,《苏报》发表的更多的煽动性文章被揭发出来,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满人九世深仇”,“杀人主义即复仇主义,以四万万人杀一人,能不决心”,等等。按照清朝的刑律,这样的文章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罪犯按律当斩。^{[3]108}由于当时民气激昂,百姓对这些革命作家多抱同情之心,法庭仅判决章太炎、邹容永久监禁。但是,在法庭上,章太炎、邹容以法庭为讲坛,揭露了清政府压制言论和卖国求荣的罪恶行径。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租界法庭最后改判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苏报》永远停刊。这一案件史称“苏报案”。“苏报案”的审判结果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涉及“文字狱”涉案人员以“谋反”、“谋大逆”等罪名严厉处罚甚至残酷处死的法制。在“苏报案”结案后的一段时间内,

尽管《大清律例》中的相关法律条文并未立即被废止,却出现了新闻宽容和执法宽容的局面。

苏报案的发生,标志着当时革命的火焰,已经能够凭借舆论的力量,向腐朽的清政府做强烈的喷射,也暴露了清廷以毒辣和卑劣的手段,多方乞助于帝国主义者,对当时鼓吹革命的知识分子予以严重的迫害。虽然,在客观上,苏报案使得革命思想的宣传和借助大众传媒这个手段的结合暂时停顿了下来,但是利用传媒宣传和指导革命思想的方法却为后来的许多革命党人所采纳和利用,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埋下了火种。“苏报案”使1903年的革命高潮发展到了顶点,成为了“辛亥革命前史中第一次革命高涨期的直接契机”^{[6]50}。

(二)“大江报案”与辛亥革命

20世纪初,新兴的报业对舆论和局势具有极大的刺激和左右作用,办报成为当时最时髦的社会风潮。在当时湖北的民办报纸中,汉口的《大江报》虽然开办时间不长,主事者仅詹大悲、何海鸣两位青年才俊。1911年7月17日,《大江报》发表了何海鸣的署名为“海”的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认定和平乃亡中国之道,根本走不通,只有轰轰烈烈的革命才能拯救中国,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26日,《大江报》又进而刊载了黄侃的署名为“奇谈”的短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称:“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痼一朵,人人病夫。……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这篇短评标题火爆,言辞激烈,公然鼓吹革命,风传一时,震动全国。湖北当局感觉芒刺在背,忍无可忍。8月1日,《大江报》馆被查封,詹大悲被捕,何海鸣自动投案。以瑞澂为代表的清廷湖北当局本拟对詹、何处以重刑,以儆效尤,但慑于民愤和各方抗议,不得不高开低走,从轻发落。9月下旬,汉口地方审判厅比照《大清报律》中的“淆乱政体,扰乱治安”一款罪名,判处詹大悲、何海鸣各监禁一年半,免科罚金,不得保释。这便是中国传媒法史上著名的“大江报案”。

“大江报案”成为政府实施专制、钳制舆论、迫害传媒人士的典型案例。湖北地方当局上下不讨好,进退失据,狼狈不堪。文学社和共进会则适时加快了筹划武装起义的步伐。9月24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胭脂巷召开大会,成立湖北革命军

总指挥部，会上通过了《人事草案》，积极准备武装暴动。10月9日上午，共进会首领孙武在汉口宝善里俄国租界内的政治筹备处搬移炸弹，部署起事，不慎引发爆炸，机密泄漏。俄国巡捕闻声而至，孙武带伤匆忙逃至同仁医院就医，机关内革命党人的名册、旗帜、印信等均被巡捕搜去，并移交给了清廷当局。瑞澂遂宣布戒严，封锁新军营门，收缴子弹，不准兵士自行出入，责令各级军官巡查镇抚。同时调集政治上相对比较可靠的巡防营、守卫队、教练队分途搜捕。革命党人在武昌、汉口的所有机关都被破获，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等30余人被捕。次日黎明前，瑞澂悍然下令将彭、刘、杨押到督署东辕门内斩首示众。另外，由于被搜获的革命党名册上，新军多人列名其中。新军性命攸关，人人自危。当晚，共进会会员、工程第八营士兵程正瀛率先击中前来弹压的该营二排排长陶启胜，打响了武昌首义的第一枪。于是，局面一发而不可收。1911年，岁次辛亥，因此史家将这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的起义和革命称为辛亥革命。“大江报案”得以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不仅在时间和机缘上有此巧合，而且在思想史上也是近代传媒法制酿成社会革命的一个典范。

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报刊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尤其是这一时期留学之风的盛行，更促进了国外中文报刊的发展。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他的名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一书中，统计了“清朝末期在日本发行的中国报刊杂志目录”，从1898年10月到1911年2月期间，共有62种报刊杂志在日本东京、横滨等地发行。实藤惠秀认为，这些“在日本发行的报刊杂志，快要达到日本一般报刊杂志的水平了，在质量上当然领先于他们本国的报刊杂志，在数量上也比他们本国的报刊杂志多”^{[7]418}。报刊作为革命的有力武器，发挥着制造舆论和宣传思想的主要作用。当时主张社会变革的报刊主要划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1905年至1907年之间，革命派的《民报》和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围绕革命还是改良展开了近代第一场报刊论战。革命派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自然代表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海改良派的主张和议论又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并不是全部真理都掌握在革命派手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两派都是爱国的，都主张中国摆脱列强的欺凌，尽快独立富强，只不过各自所开出

的救国药方不尽相同罢了。革命派相当于西医，改良派相当于中医。^{[1]102}因此，从狭义上讲，辛亥革命主要是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从广义上说，辛亥革命则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共同推翻清朝统治的一场政治运动。

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无限制言论自由原则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临时政府在传媒法制方面，参考了国际上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推行了比当时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广泛更宽容的无限制言论自由原则。

临时政府成立后，首先立即废除了《大清报律》等新闻法规，其次于1912年3月2日由内务部颁布了《民国暂行报律》。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暂行报律》全文只有三条，第一条规定：“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8]51}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了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和处罚，但仅限于“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和“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两个，其限制之少为当时世界各国新闻立法所罕见。

即便如此，当时的新闻界仍然反对临时政府通过立法限制新闻自由的做法。时任总统府枢密顾问的章太炎就撰写了《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一文，强烈反对报律，认为“民主国本无报律”，“观美法诸国，对于杂志新闻，只以条件从事，无所谓报律者”。迫于压力，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作出了让步，宣布《民国暂行报律》不具备法律效力。1912年3月11日，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宪法的形式对言论、出版等自由作出了规定。《临时约法》第2章第6条第4款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第2章第15条则规定了限制上述自由的情况和方法，即“本章所载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由于《临时约法》规定了广泛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而对这些自由的限制必须“依法律限制之”，其时的限制性法律《民国暂行报律》又被宣布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民国初年所构筑的传媒法制实际上贯彻的是无限制言论自由原则。有学者认为，民国初期的新闻自由实际上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

后不久,提倡西欧的“天赋人权论”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结果,《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就是孙中山的“天赋人权论”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条文化、法典化。^{[9]116}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也认为,言论自由是天赋予人民的权利,人民的这种权利通过斗争从专制势力手中夺回之后应予宪法形式予以规定,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在批判袁世凯的《胆大妄为之袁世凯》一文中指出:“报纸为舆论之机关,言论为天赋之自由,千百志士,洒如许热血,所欲得者,此其一也。”^{[10]237}但是,上述孙中山和戴季陶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国情”中将迫不得已地发生变化。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民智未开的现实使他们的思想不得不转换到了国家、集团优先的方向。

尽管好景不长,但是民国初期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确超越了当时世界上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仅就《临时约法》的条文看,可以说是远远超越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有不少优秀的内容。^{[11]19}这一情况,在1912年5月发生的戴季陶喊《杀》案中有比较形象的展现。1912年5月,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接受银行团垫款,签订了允其监督财政的《监视开支暂进垫款章程》。其行为引起了国人的不满,人们群起攻击熊希龄卖国。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天仇”的短文,题曰《杀》,全文一百来字,却言辞激烈。文章开头即以喊“杀”政府领导排比:“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

《民权报》系戴季陶于1912年3月在上海租界创办。从1912年4月起,戴季陶在《民权报》上接连发表了数十篇批判袁世凯的文章,其中有《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罪状》、《讨袁世凯》等。5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以“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提究”^{[12]44}为由,拘捕了戴季陶,但是第二天戴季陶即被保释。在戴季陶被捕的当天,上海日报公会即提出抗议,5月23日起《天铎报》又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了此事。更为有意思的是,被戴季陶扬言要“杀”的唐绍仪,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季陶说情,称“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尽管后来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对戴季陶提起了公诉,但是迫

于舆论压力和政府传媒的宽容意见,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公开作出的宣判只是:“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故判处“罚洋三十元”。

戴季陶喊《杀》案的轻判,与民国初年《临时约法》等确立的无限制言论自由原则有很大的关系。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北洋政府虽然对人民实行高压和恐怖统治,但是由于在传媒法制上尚未出现严格“审查”、“限制”之类的法律规定,使得一部分有识之士能够依据《临时约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对政府提出批判,施加影响。政府限制言论自由也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因此不敢蔑视民意,胡作非为。

三、民国传媒法制的转折点

(一) 癸丑报灾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日趋激化,他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加强了对舆论的管制,报界的极盛时代宣告终结。在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之后,袁世凯为了巩固政权,实现个人独裁,恢复帝制,采取种种措施,强化控制,使报业陷入长达4年的低潮。

1913年4月29日,《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新中国报》在评论宋教仁被刺案时,使用了“万恶政府”、“政府杀人”、“政府罪状”、“民贼独夫”等语言斥责政府,激怒了袁世凯。5月1日,袁世凯指令内务部按照《大清报律》或刑律第16章第31条予以“严重取缔”,以实现其所谓“重秩序而安人心”的目标。考虑到国民党势力未减,尚在议会占据多数席位,内务部未敢即可封禁上述3家报馆。但内务部据此对全国报馆发出训令:“查报律第11条、第13条,暂行新刑律第16章第221条、第31章第359条、第360条均列有专条,律禁森严,诿容玩视。”明确表示将用前清报律和新刑律来限制报馆,责令各省都督、民政长转饬各报馆“一体遵照”。这一训令为清末报律再次肆虐报界打开了方便之门,使报界面临着报律和刑律的两重控制,言论自由遂成具文。^{[13]170}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政府开始在各地大规模封禁国民党系统及同情国民党的报刊。7月20日,北京《日日新闻》被封;22日,北京《民国报》被封;24日,浙江《平民报》、《浙报》、《天钟报》、《浙江民报》、《浙声》被封;31日,北京《中央新闻》被封;8月1日,北京《正宗爱国报》、《京话报》被封;

17日,杭州《汉民日报》被封;20日,福建《群报》、《福建民报》、《共和报》被封;25日,《国风日报》被封;27日,南昌《晨钟报》、《豫章报》被封;30日,《锡报》被封。^[14]⁷¹³由于上海各报多数在租界内出版,袁世凯政府不能直接查封,遂采取禁售的办法,限制在内地发行。8月4日,江苏淞沪警察厅发布《禁绝乱党机关报纸》的告示,禁止售卖《民立报》、《民权报》和《民强报》。1913年9月,袁世凯的武力统一政策暂时取得成功。在利用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决意踢开政党与国会。11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与地方军阀李烈钧有联系为籍口,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同时对各地国民党系统的报刊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全国报界顿呈一片肃杀景象,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长沙、成都、福州、开封、南昌等地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全被查封。据统计,民国元年全国报刊约500家,北京占1/5。“二次革命”后,北京的报刊只剩下20家,上海5家,汉口2家。至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民国元年锐减了300多家,新闻出版遭受到了重大打击。^[14]¹⁵⁴1913年正逢农历癸丑年,当时新闻出版人将这一年报纸遭受的浩劫称为“癸丑报灾”。

由于1914年5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第2章第5条第4款规定“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这给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提供了可趁之机。1914年4月2日内务部颁布有《报纸条例》。这一条例共35条,主要规定:实行出版物批准制加保证金制,报刊不得刊载“淆乱政体”、“妨碍治安”、“败坏风俗”、“外交、军事之秘密”等内容,所有报刊“应于发行日递送警察署存查”。北洋政府的《报纸条例》实际上是套用了日本1875年制定的《新闻报纸条例》,且比日本的《新闻报纸条例》更为苛刻。当时的《申报》编者对《报纸条例》作出了这样的评论:“系照套日本新闻纸体条例,而去其宽平,加以苛重。”^[15]1915年7月10日,袁世凯政府根据《报纸条例》的执行情况作了一些枝节性的修改,又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修正报纸条例》。1914年12月5日国务总理孙宝琦签署颁布了《出版法》,不仅把《报纸条例》中的限禁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文字、图画等印刷品和出版物,而且规定更为苛刻。1915年4月,北京政府还颁布了《电信条例》,规定无线电器材属于军用物品,非经陆军部

特别许可不得自由输入中国。其后,北京政府还颁布了《著作权法》、《新闻电报章程》、《检查扣留煽动邮件章程》、《报纸法案》、《查禁俄过激派印刷物函》、《管理印刷营业规则》、《管理新闻营业条例》、《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则》等涉及限制新闻传媒的法规。至此,辛亥革命后不久南京临时政府所提倡和确立的以无限制言论自由为基础的传媒法制被彻底颠覆。

(二)火烧晨报馆事件

1917年6月,张勋复辟丑剧草草收场,段祺瑞以“再造共和”、“恢复民国”的功臣自居,操纵政坛,迫于舆论,他做出了“民主”姿态,取消了报禁。民国的报业因此有机会得到了短暂的恢复。《晨报》的前身《晨钟报》系改良派研究系(宪法研究会)领导人汤化龙、梁启超等于1916年8月15日创刊的研究系的机关报。李大钊担任过《晨钟报》的编辑主任,在《晨钟报》创刊号上发表有署名“守常”的文章《〈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从该文中使用的“破坏”、“青年”、“青春”、“民族”、“自由神”、“理想”等字眼看,“其发言的思想底色是进化论和民族主义,它们构成了李大钊后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驱动力”^[16]³³。在段祺瑞假民主的面目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之前,《晨钟报》曾支持段,及至段的专制本质暴露之后,研究系在派系斗争中受排挤,对段的专制政策多有批评。1918年9月,《晨钟报》因揭露段政府以出卖主权为代价向日本政府大量借款,遭查封。1918年12月1日,《晨钟报》又复刊,易名为《晨报》。

《晨报》当时在北京有很大影响,发行量将近一万份。在每天的新闻正张之外,还有一个发表文艺与学术的附张,叫《晨报副刊》(它由鲁迅命名),这是北京知识界自由言论的一个公共平台。最初由李大钊主编,1920年7月,由孙伏园接手。1920年8月1日,胡适、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疾呼:“自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了,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郑重提出,请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17]这里所说的“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主要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等。

1925年10月1日,《晨报》请来徐志摩担任副刊主编。1925年11月29日下午五时左右,位于北京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竟然被游行群众捣毁一空并焚烧。1925年12月7日,《晨报》复张后,在放火的幕后指使上,该报社论认为有三种情况。一是反共产说,因《晨报》反共产言论所致。一是党派倾轧说,因《晨报》被视为研究系机关报所致。一是同业煽动说,因同业竞争所起。如果不论最后一说,当时作为进步力量的国共两党都是反对《晨报》的。因为早在民国初期,梁启超的进步党就是国民党的对头。及至当时,由于《晨报》的反苏立场,更招致年轻的共产党的反感。因此,当时一般人认为,《晨报》被焚,主要是出于前两种原因。

不可否认的是,《晨报》馆被焚事件与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起的苏俄问题大讨论有直接关系。当时,《晨报副刊》每周一、三、四、日出刊,一周四张,由徐志摩负责。除此之外,每周还改出三个周刊,分别是《社会周刊》、《国际周刊》和《教育周刊》,三刊则由《晨报》其他人负责。10月6日,由刘勉己负责的《社会周刊》刊登了北大教授陈启修的文章《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10月8日,徐志摩的副刊就有了回应,这就是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的《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以这两篇文章为发端,《晨报副刊》包括它的《社会周刊》和《国际周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主战场就是“晨副”,主持人就是徐志摩、刘勉己等。仅10月份,徐志摩就推出了两个讨论专辑“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并且都亲自撰写前言。在不到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晨副”及其周刊发表的讨论文章达五十来篇,讨论至白热化时,11月29日的一把火,烧毁了《晨报》馆,也烧掉了这次讨论。

事件发生后,胡适致信陈独秀,两人因对《晨报》馆被焚的观点不同而引发争论。胡适对《晨报》馆被焚事件表示出对言论自由和宽容的担忧,陈独秀却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在回信中,陈独秀反问胡适:“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这一问,在胡适心中激起千层浪。1925年12月间,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你我不是曾同发表过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

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是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18]355}在胡适看来,像《晨报》纵火案这样的事件,分明是国民党和其他政党在尚未执政时就先行施展的压制言论自由的新手法和文化法西斯。胡适给陈独秀信是这样哀伤结尾的:“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18]357}值得深思的是,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上,胡适的话,不幸应验。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饱经风霜后的现代,我们不能不惊叹胡适提倡的“容忍”思想的先进性——“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19]824}。

四、结语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前夜,鼓吹革命或立宪的报刊杂志的大部分是在日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出版发行的,这就意味着辛亥革命后的传媒法制必将受到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传媒法制的直接影响。事实上,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所推行的传媒法制是彻底贯彻了言论自由原则,在自由度上甚至超越了当时的日本和美国。革命派虽然构建起了以《临时约法》保障言论自由为基础的传媒法制,但是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宪法的言论自由原则与《民国暂行报律》等的协调关系。这不仅违反了《临时约法》本身表明“人民之权利……得以法律限制之”的规定,而且《报律》等的无效和缺失也助长了民国初期报刊业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因此,民国初期的“无限制言论自由原则”下的传媒法制多少带有空想自由主义的色彩,而与当时的国情不符。有学者甚至认为:“对清末民初新闻自由造成很大戕害的是绝对主义新闻自由思潮。不要报律、不遵守报律是其典型表现。这种表现在清末尚有促成封建王朝瓦解的积极作用。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就是非理性的,弊远大于利。袁世凯制造癸丑报灾是残酷的,但新闻界的‘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并煽动暴力,却为报灾埋下了伏笔。”^[20]

传媒与法的历史经验表明,要想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排除埋藏在传媒人身边的

危险,首先就需要有强大的传媒法律法规作为后盾和保障。言论自由也许正如有的学者所崇尚的那样,是“民主的生命之血(lifeblood)”^{[21]4},但是在传媒意义上的任何传播内容和方法又都因为其或多或少的政治性质而要受到政治的指导或影响。实际上,“在每一个国家,包括美国,新的媒体也都要受到那些适用于传统印刷媒体而被认为是

是不宽容的规定的限制”^{[22]12}。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也不是绝对的,法院允许在表达自由上设置各种各样的限制。只不过是,这些限制的大部分将归类于随后的处罚,而不是在前的限制(prior restraints)。^{[23]62}包括章太炎、戴季陶在内的辛亥革命的传媒领路人显然是

忽视了法律或司法对传媒的引导和保障作用,也没有能够全面理解和领会诸如在法国、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中传媒与法律、司法的密切关系,以致片面地汲取了这些国家中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原则,舍去了不可或缺的法律和司法对言论自由的规范原则。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的传媒法制有过非常勇敢和赋有理念的探索实践,在我国的传媒法制史上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它的某些经验无疑是值得我们汲取和发扬光大的。同时,辛亥革命时期的传媒法制所暴露出来的空想自由主义色彩,也是我们这个信息自由时代需要特别予以警觉和引导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 [2]刘慧娟.烽烟报馆[N].北京晚报,2011-5-13.
- [3]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一部关于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M].刘小磊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4]徐中煜.清末新闻出版案件研究——以“苏报案”为中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5]章太炎,邹容.近代名家名人文库·章太炎、邹容[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 [6]严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M].东京:岩波书店,1991.
- [7]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M].东京:くろしお出版社,1960.
- [8]刘哲民.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2.
- [9]张晋藩,曾宪义.中国宪法史略[M].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
- [10]刘利民.戴季陶早年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11]石冢迅.中国的言论自由[M].东京:明石书店,2004.
- [12]范小方,包东波,李娟丽.戴季陶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 [13]赵建国.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M].北京:三联书店,2008.
- [14]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 [15]编者.关于报律之商榷者[N].申报,1914-04-17.
- [16]张涛甫.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以《晨报副刊》为例[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17]胡适等.争自由宣言[N].晨报副刊.1920-08-01.
- [18]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
- [19]胡适.胡适文集(1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0]孙旭培,殷莉,路鹏程,吴麟.法律是自由的“拯救者”——清末民初新闻自由评析[J].批判传播评论,2011,(1).
- [21]Andrew Nicol QC, Gavin Millar QC & Andrew Sharland. Media Law and Human Rights[M]. Blackstone Press Limited, London, 2001.
- [22]Eric Barendt. Media Law[M]. Dartmouth, Aldershot, 1993.
- [23]Wayne Overbeck, .Major Principles of Media Law[M].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Toronto, 2004.

[责任编辑:叶素]